

广东人口与发展

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

(下册)



广东经济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广东人口与发展

(下册)

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ISBN 7-80632-933-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东人口与发展 (上、中、下) / 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编著. —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3.12
ISBN 7-80632-933-1

I. 广… II. 广… III. 人口—研究—广东省
IV. C9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02082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5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刷	华南理工大学印刷厂 (广州市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内)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张	95
字数	1780千字
版次	2003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3年12月第1次
印数	1~2000册
书号	ISBN7-80632-933-1/C·37
定价	全套 (1~3册) 380.00元/套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编委会

主 任：卜新民

副主任：叶健夫

编 委：彭启鹏 马 建 黄春红 王 彪

总 编 辑：叶健夫

副总编辑：彭启鹏 马 建

编辑人员：刘 德 刘建民 叶丽莎 李 彪
陈培红 钟作勇 翟 丰 曾文棣

编辑说明

举世瞩目的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是首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人口普查，也是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广东省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在各级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各级普查机构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经过全省70万普查工作人员历时五年的艰苦努力，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取得了丰硕的普查成果。

这次人口普查获得了丰富、翔实、准确的人口数据资料，涵盖了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变化情况以及住房和生活质量状况等方面。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广泛动员全省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分别组织各市普查办、省直有关部门、高校科研单位三个层面的专项课题研究，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利用，充分发挥了人口普查资料的社会经济效益。

本书就是这些开发研究成果的综合反映，共选入了第五次人口普查国家级重点课题3篇，省级重点课题84篇，还选入了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撰写的8篇分析研究报告，是集我省人口普查开发利用成果之大成。这些论文是各方面专家学者和人口普查实际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角度对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决策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而且也使得人口普查发挥更大的社会 and 经济效益。

《广东人口与发展》一书分为人口控制与发展战略、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发展与现代化、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养老保障、人口迁移流动与管理问题、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人口住房与生活质量、人口普查技术等九部分。为便于查阅，每个部分按各篇论文的主题和内容的相近

性，以及先全省后分市的顺序进行编排。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采用了与国际接轨的长短表技术，普查得到的人口行业、职业、婚姻、生育、迁移、学业完成情况、居住环境等数据由普查长表资料汇总而来。长表数据为抽样调查数据，抽样比为我省常住人口的 9.44%。由于各位作者在使用这些数据推算总体时所采用的推算方法有所不同，从而导致推算出的绝对数相互间存在着细微差异。我们在编辑中为了保持论文的整体性和作者采用的推算方法，故未作统一改动，敬请阅读时留意。

限于编辑水平，恐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03 年 11 月

目 录

一、人口控制与发展战略

广东人口发展的新变化	卜新民	3
广东省农村多孩生育问题仍较严重	彭启鹏、马 建	6
广东人口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马 建	11
人口控制效果与稳定低生育水平	时述花、云 斌、张卫国等	14
广东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及现状分析	钟作勇	25
东西两翼人口控制的难点与对策	周春山、刘 江	36
广东人口死亡率水平及预期寿命研究	刘建平、韩兆洲、宋剑波等	48
珠江三角洲人口发展对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陈茵茵、侯学平、褚玉江	85
广东省人口户籍状况与人口管理制度改革	李若建	100
广东省IT人才战略与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颜小珂、章敬东、李 琴等	114
广东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现状与思考	罗木生、李秀英、李清国	144
广东经济特区人口状况的比较分析	林梦生、吴 源、何颖敏等	152
湛江市人口增长与总量控制	钟胜保	164
山区人口问题与小康研究	陈土清、郭树宽、刘东富等	179
揭阳市人口现状、发展趋势及计划生育面临的新问题	林雄波、姚祥辉	190

二、人口与经济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叶健夫、彭启鹏、马 建等	211
入世过渡期广东省就业形势与对策研究	李惠武、陈 杰、吴森富	241
广东省人力资源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研究	周光复、朱向伟、吴清华等	255
广东失业人口分析	刘梦琴	284
广东省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钟永豪、袁建文	298
广东省人口行职业结构变化分析	袁 政、李 彪	322
广东就业结构现状与优化分析	阙广长、张建武、黎俊宁	334
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胡志勇、李祥伟、李 惠等	345
广东劳动力资源与失业状况分析	彭启鹏、钟作勇	359

广东在业人口行职业构成分析	罗健波	367
广东省人口文化素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分析	陈 杰、张栓虎、傅华英	381
广东省人口职业变化与社会阶层演变	何新发、黄映川	392
广东省妇女文化素质与就业问题	郭志坚、翟 丰	413
广东技术工人现状与需求预测	陈斯毅、罗福群、葛国兴等	435
人口快速增长对惠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陈健生、魏如泉、余燕安	450
广州经济结构调整与劳动就业的关系研究	吴永佳、叶荣基	461
珠海市在业人口构成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	李银好、李 伟、王梦阳	475
江门市在业人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温小敏	487
云浮市各镇人口特征的聚类分析及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分析	朱正国、张少飞、康就升等	505
湛江市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及对策分析	廖国树	522

三、人口与社会

广东城镇化进程分析与对策建议	彭启鹏、曾文棣	537
广东省人口城市化发展趋势与城市规划建设	李 玲、蔡 瀛、杜 挺等	548
从广东人口城镇水平谈城镇化指标体系	梁玉成	576
广东城市化发展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研究	翁祥鸿、黄成龙、冀 云等	592
广东省人口文化素质研究	陈铭津、王 迎、王 军等	603
广东省成人教育定位研究	汤 清、何颖敏、吴 源等	616
广东人口结构与教育发展的规模和政策选择	张耀荣、袁 政、谢颂凯等	633
广东城市文化建设与城镇人口素质的关系	胡玲玲、陈京松	659
广东省离婚人口现状考察	郑 晨	667
转型期广东人口的婚姻变迁	李伟民	682
广东家庭生命周期与人口增长问题	张硕城、张建武	694
广东省家庭规模与家庭关系的变迁及其影响	刘伟文、陈培红	709
人口性别比特征及其社会后果研究	杜艳红、陈培红	722
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分析	阎志强、钟英莲	751
广东省人口死亡率水平与医疗保健事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李奕明、吴圣明、高 瓦等	767
提高人口素质实施人才战略	张硕城、林 勇、陈 述	778
广州人口文化素质分析	郑纪军、邓立坚、罗志雄	789

阳江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黄苑雄、黄允宏 803

四、人口发展与现代化

广东省人口现状与现代化的距离及对策研究 卫海英、杨智勤、杨 喆 823

广东人口发展与交通建设的关系研究邓立文、尹良龙、朱信山等 845

珠江三角洲人口发展与城市建设规划丁 宪、宋社和、郑树霞 857

广东人口特征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张硕城、林 勇、陈 述 868

顺德市人口特征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关系的研究顺德市人口普查办 880

珠海人口特征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夏咸庆、赵来忠、杨建胜 897

汕头市人口控制问题研究张胜忠、罗舜煜 910

石灰岩山区人口问题与小康研究何高旗、张育民 929

五、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养老保障

广东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和趋势与对策研究曾碧忠、周光复、方 亮等 947

广东老年妇女养老问题研究柏 萍 965

广东省人口老龄化与城乡养老保险研究马 斌、程贯平、刘文军 979

广东省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研究戴由武、曾 瑾 993

从“五普”人口结构看东莞社会保险覆盖面的扩展空间东莞市人口普查办 1002

适度城市人口规模与惠州城市化发展关系研究陈友莲、梁冠斌、余燕安等 1017

浅析潮州市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养老保障问题陈俊贤、戴 冰、黄淑乔 1033

稳定低生育水平与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障梁 超、谭侯勳、陈甲元 1047

六、人口迁移流动与管理问题

广东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叶健夫、彭启鹏、黄春红等 1061

社会发展中的人口迁移流动问题探讨马 建 1085

广东省流动人口生育问题研究云 斌、张卫国、庄俊义等 1102

政府在人口迁移流动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问题吴 江 1111

“五普”广东省人口移动态势及影响分析郑梓桢 1123

广东贫困地区人口外流问题研究陶水莲、张仁寿、尹丹华等 1139

人口外流对韶关经济发展的影响	杨应满、张盛福、陈素英	1160
流动人口与东莞市经济社会发展	东莞市人口普查办	1173
普查中外出人口和暂住人口分析	方绳长、丁木文	1200
深圳人口聚集与经济的关系	邓 平、陈凤基、伍健铭等	1212
浅析外来人口对中山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山市人口普查办	1239
深圳市人口状况与人口管理对策研究	邓 平、陈凤基、伍健铭等	1251
佛山市人户分离状况与户籍改革分析	佛山市人口普查办	1289

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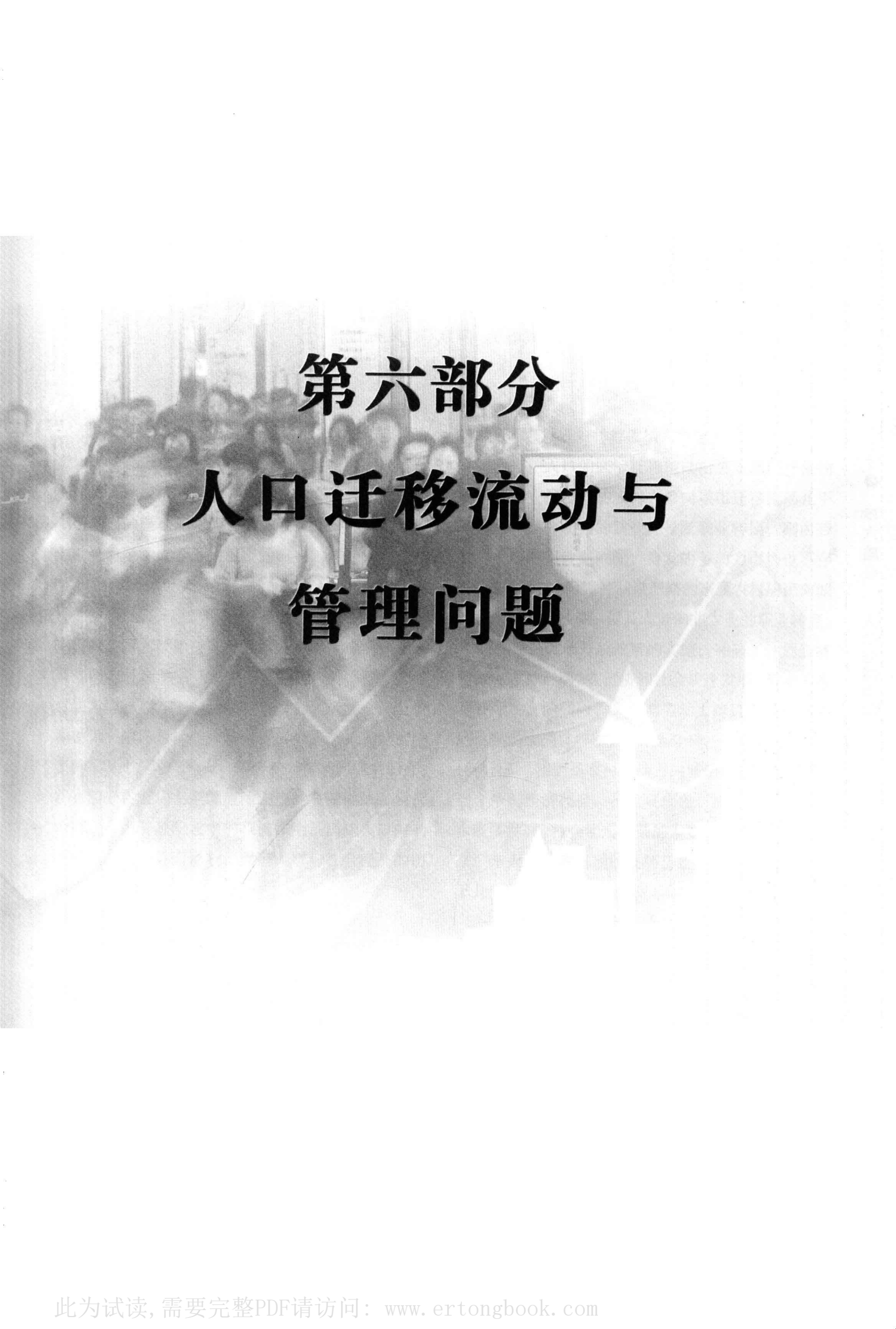
试论为广东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叶健夫、黄春红	1305
广东人口发展与国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陈茵茵、侯学平	1312
广东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研究	吕凤林、顾志沛、王大力等	1337
广东人口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钟逢干	1350
河源市人口、资源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河源市人口普查办	1364
从人口问题看汕头可持续发展	张胜忠、张瑞权、陈 恩等	1377

八、人口住房与生活质量

广东城乡家庭住房条件和居住质量比较研究	夏志红、叶丽莎	1399
广东住房条件与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蔡 赢、姜洪庆、周春山等	1413
茂名市城乡居民住房状况与生活质量的探讨	梁 超、谭侯勤、李超文	1430
肇庆市城乡家庭住房情况分析	梁瑞伟、卢嘉权、梁洁庆	1447
韶关居民住房的现状与发展构想	杨水养	1455
梅州市城市人口增长与居住环境改善问题探讨	杨志濂	1466

九、人口普查技术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普查方法的探讨	朱中华、陈电雄	1479
------------------------	---------	------



第六部分

人口迁移流动与 管理问题

广东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叶健夫 彭启鹏 黄春红

刘建民 钟作勇

广东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一大社会现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随之频繁和加快,并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构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广东人口与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更加突出,流动人口的总量居全国首位。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全省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530万人,分别占全国流动人口和全省常住人口的17.52%和29.28%。如此大的流动人口规模,无疑给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巨大的影响。因此,对广东人口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在宏观上把握流动人口的发展规律,发挥政府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消除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流动人口产生的历史背景

人口的迁移流动,在人类有史以来的各个时代,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迁移流动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行为,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及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产生和发展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一)人口与劳动力迁移流动的发展轨迹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人口与劳动力的

区域分布及就业安排都被纳入高度的计划调配之中。具体而言,人口的区域迁移流动由公安部门严格控制,计划安排之外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几乎不可能;而劳动力的就业安排及职业转换,则由劳动、人事部门计划调配,自发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存在。在这种体制下,控制最严格的当属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身份改变,以及农业向非农业的职业转变。

然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各种束缚,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开始发育的同时,人口与劳动力跨区域迁移流动的范围和规模日益增大。时至今日,人口与劳动力的迁移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一种重要现象,成为影响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繁荣的重要因素。纵观建国以来广东人口迁移流动的发展历程,可将其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 1950 - 1960年:人口迁移流动活跃时期

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53-1957年“一五”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较快,由于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需要,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镇,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到1957年广东有非农业人口597.13万人,比1949年增长了36.5%,年均递增4%,比同期广东总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约高了2个百分点。1958-1960年是“大跃进”时期,由于急躁冒进,城市建设违反客观规律,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广东非农人口在这时期迅速膨胀,且以每年

平均 11.8% 的速度递增,到 1960 年达 763.62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到 22%。同期,省外迁入人口约 3 万人,这主要是建国初期从南下大军及老解放区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参加地方建设,这批干部的南下构成了省际人口迁移的主体,但相比省内人口迁移规模要小得多。广东人口迁移之所以如此活跃,除了与当时城市大规模建设对劳动力有大量需求外,还与我国当时实行了一套自由的人口迁移流动政策分不开。如 1951 年公安部颁布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特制定本条例”。1954 年《宪法》第 9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可见,当时的政策是明确保护人民的迁徙和居住自由权利的。

2. 1960-1977 年:人口迁移流动非正常时期

1961 - 1965 年,由于自然灾害和经济政策失误等原因,国家调整政策,压缩建设规模,精简机关、企事业人员,动员城镇人口回乡。这时期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干部下放劳动或返回原籍,以及部分入城人口被清退回农村。此外,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一系列户籍管理制度开始实施,对人口的迁移流动也起着关键的制约作用。到 1965 年,广东非农业人口为 679.99 万人,比 1960 年高峰时减少了 83.63 万人,非农业人口比重回落到 17.6%,下降 4.4 个百分点。

1966 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中国的政治、经济处于动荡时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这时期除了干部继续被遣返回乡外,还出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这些共同构成了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的主体。1966-1970 年,全省被遣返回乡的干部达 29 万人;1968 - 1977 年,广东先后共有 98 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 1968 年规模最大,人数达到 17.6 万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广东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城镇人口比重回

落,1966 - 1978 年,非农业人口年均递增只有 1.5%,低于总人口的 2.1% 的增速。到 1978 年,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回落到 16.3%,比 1966 年低 1.1 个百分点。这一时期省际人口迁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每年迁移率不足 1%。

3. 1978-1984 年:人口迁移流动恢复发展时期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各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得到了纠正和调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下放劳动的干部和被遣返回乡的干部及家属相继返回城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涌现出剩余劳动力,农民开始进城务工经商。1984 年 10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除县城以外的各类县镇、乡镇、集镇,包括建制镇和非建制镇,全部对农民开放,这规定无疑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开启了一条门缝。1979 年后,广东省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和一批经济开发区及高新技术产业区。为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从省外调进了一大批经济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同时,省内山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也逐步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迁移流动。这一时期省内人口迁移率回升到 20‰ 左右,省际迁移率也达到 2‰ 以上。

4. 1985 年至今:人口迁移流动快速发展时期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先走一步,广东的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劳动力的聚集和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时期省内和省际迁移流动人口呈逐年上升趋势,省内人口迁移率超过 30‰,省际人口迁移率也达到 10‰ 以上。据公安部门资料,1996 - 1999 年全省迁入人口分别为 113.47 万人、130.94 万人、117.93 万人、和 107.68 万人。省外净迁入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每年净增人口的 22.8%、27.4%、25.7% 和 10.1%。未经正式户籍迁移的劳动力数量更为巨大,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外省离开户籍

所在地半年以上的来粤流动人口有1506.49万人,占全省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0.2%和59.5%。同时,全省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1996-2000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4.1%、6.3%、7.3%、6.4%、7.0%,其中转向城镇的分别占96%、71.4%、62.2%、60.3%、69%。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有广东户籍的省内流动人口为1023.95万人,占全省户籍人口比重的13.7%。

(二) 人口与劳动力迁移流动的动因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流民这个概念,常常可以涵盖四种类型的农民。其一,丧失土地而无所归依者;其二,因天灾人祸而流走他乡者;其三,出外求乞者;其四,盲目进城者。而造成这些类型流民的主要原因,不外乎土地兼并、苛政猛于虎和天灾人祸。

但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既不是丧失土地而生活无靠,也不是横征暴敛或天灾人祸,而是农民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美好生活的过程,是顺应中国产业结构转换和城市化规律而做出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农民流出农村后,不再是乞讨为生或流为盗贼,而是成为新生经济部门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的流动,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那么,吸引中国人口与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翻开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并对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深层的研究,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当今中国大地农村人口与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归根结底,是受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各种制度约束所形成的人口流动势能的作用和地区间利益差别的驱动。

1. 人口与劳动力流动的原始势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今日看到的“民

工潮”并非无源之水,而是特定时期、特定战略造成的历史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尽快建立起中国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国家推行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统帅下,相应地形成了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管理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这制度框架实施的后果是,减少了工业化过程中对劳动力的吸收,隔断了农业劳动力的职业转变和农村人口的身份变更。

事实正是如此,统购统销政策,要求生产和生活资料高度的集中,这就迈出了阻断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第一步;人民公社制度则把农村劳动力限制在以农业为主、以粮为纲的农村经济活动中,其职业身份难以改变,结果是迈出了隔断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第二步;最为严厉的是户籍管理制度,它对城乡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做出了进一步的约束,把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的身份固定下来,把农村人口的居住地基本限制在农村。

显然,重工业优先战略背景下产生的三位一体制度框架,构筑了一道阻碍人口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屏障,使全国人口与劳动力转移不能以一个均衡过程实现,从而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发达的工业经济与较为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存在的含义是,占全国劳动力资源较大比重的农村劳动力,仅创造全部国民收入的一个较小份额;而较小比重的城市劳动力,却创造了较大的一个国民收入份额。

与世界发展国家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模式比较,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换、以及城市化的进程显然滞后。在典型的情况下,发展国家的农业产值和非农业产值比重在人均收入不到100美元(1964年价格)时就已达到相等;随后在人均收入达到200~300美元,即人均收入提高1~2倍时,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比重达到相等;当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到400~500美元,农村人口与城市人

口比重达到相等。然而,在1978年以前,全国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就已下降到50%以下(1978年为28%),但那时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高达82.08%。到1995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493元(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大约是1978年379元的4倍,然而1995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仍高于50%,特别是到2000年时,全国人均国内总产值已达到2117元(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但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比例及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还高达64.38%和63.91%。

由此可见,中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换,远远滞后于典型发展国家的转换模式,城市化的进程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使得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大量劳动力的就业既不充分,收入水平也得不到提高。据1979年统计年鉴资料测算,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的42%,全国农村大约有2.5亿多人口还处于贫困的状态。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事实上就是一种历史负债的偿还,是一种巨大势能积蓄的结果。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2. 人口与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力

根据人口学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在人口迁移流动的过程中,迁出地存在一种“推力”,推动当地居民迁往外地;迁入地存在一种“拉力”,拉动吸引外地居民迁入。人口迁移流动的行为,就是地区之间不同的推力、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无可置疑,当今中国农村人口与劳动力的迁移流动过程,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推力和拉力。

首先,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那就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家庭联产承包制一实行就焕发出了无限的生机,它打破了以往吃“大锅饭”的劳动分配制度,改革了统购统销的生产资料供给

政策,调动了农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释放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此外,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本身就具有解放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生产要素的效果,其最终的结果也加速了城乡生产要素的流通。显然,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提供了最初的、也是基本的推动力。

其次,随着城乡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乡镇企业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过程对吸纳农村劳动力有着不同的效果。1984年以前,乡镇企业在吸收农村劳动力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那时乡镇企业的产值占农村经济总值的份额及职工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都很小,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尚未发挥出来。1984年1988年期间,乡镇企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生产的产值还是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都比前翻了番,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乡镇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环境。一方面,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及其它非国有经济的扩张和壮大,对乡镇企业的市场经营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乡镇企业产品的流通、产品的质量以及生产手段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对这种竞争挑战,必然要求乡镇企业通过加快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率,以获得更高的竞争力。这种竞争的代价,就是在加快技术进步的同时,资本的投入相对增加和吸收劳动力的速度放慢。此外,乡镇企业产权模糊不清、与现代企业制度格格不入的现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镇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事实正是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乡镇企业经过短时期稳定发展后,经济规模及发展

速度开始逐年下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也逐步减弱,并再次降至较低的水平。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先升后降的趋势,削弱了农村内部企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功能,这种情况形成了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二级推力。

第三,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构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力。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地区间总存在着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这现象导致了区域间人均收入水平的不平衡。

地区间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在我国历来存在,如1995年,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分别为41.24%、35.75%及23.01%,而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分别是58.33%、27.53%和14.14%。可见,中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表现为从东至西,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梯度式减弱趋势。这种经济发展的区域梯度性,导致了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

总结上述观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劳动积极性,从而形成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强大推动力;乡镇企业日臻成熟的发展趋势,降低了吸纳农村内部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因而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二级推动力;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形成了利益动机方面的拉力。

蜿蜒百川,终归大海。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地驱动劳动力转移的所有推力、拉力之合力,把中、西部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向神州大地经济的增长中心牵引。

3. 广东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劳动力转移提供实现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贯彻执行中央赋予的特

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利用毗邻港澳、外资来源渠道广、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先走一步,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跻身全国前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2000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9662.2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535.72亿元、财政收入910.59亿元、实际利用外资额145.75亿美元、邮电业务总量831.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071.95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1701.06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8667.29亿元,均居国内前列,分别占全国10.6%、10.5%、6.79%、35.7%、23.6%、11.9%、35.9%及13.5%的份额,远远高于广东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6.67%的比重。

伴随着广东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经济,就如“离离原上草”一般,逢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蓬勃兴起并获得快速的发展。这些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使全省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增。面对大量劳动力的有效需求,珠江三角洲在吸收消化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之后,仍存在较大的劳动力需求缺口,因而出现了地区性劳动力的短缺现象。此外,城镇建设的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交通、能源、通信三大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人们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提高等这一切的变化,都对外地人口及劳动力产生了强劲的吸引力。正是这股吸引力,牵动着近年来“千万民工下广东”的壮观的社会景象。

二、流动人口构成特征

(一) 流动人口规模和地区分布

1. 规模与发展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广东流动人口共有